

湖北省黃陂縣革命史初稿

——抗日戰爭時期部分——

(續完)

歷史系黨史調查隊

第三節 抗日軍民的堅持鬥爭和根據地的巩固

(一九四一年五月——一九四三年十月)

一九四一年，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的中期，這時國際法西斯陣營在軍事上取得了暫時的優勢。日寇為了擴大對太平洋的軍事冒險，變中國為它的後方基地，對解放區發動了大規模“掃蕩”，而對國民黨則繼續採取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針。由於日寇的誘降，國民黨實行「曲線救國」的陰謀，指使其軍隊大批的投敵，配合日寇進攻解放區，為投降妥協作好準備。國民黨更變本加厲的製造磨擦，並于一九四一年一月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在敵偽頑夾擊下，我根據地處於最困難的境地，戰鬥在華中敵後的新四軍在皖南事變後，重新整頓了組織，壯大了力量，與廣大的抗日羣眾一起，為巩固解放區堅持了艱苦的鬥爭。

一、敵人的猖狂進攻，抗日軍民艱苦鬥爭的勝利

(一) 根據地建立後敵我頑犬牙交錯的形勢：

根據地開辟後，北部山區成為我縣根據地的中心地區，在南部平原丘陵及沿交通綫兩側的狹長地帶，我們發動了廣泛的游擊戰。從戰略地位來看，黃陂背靠鄂豫邊區的心脏大悟山，南近敵人華中最大的據點——武漢，有着抗击敵人進攻、保卫根據地腹地的首當其衝的重要戰略地位。

黃陂淪陷後，敵寇在漢(口)宣(化)、黃(陂)孝(感)、漢(口)麻(城)公路沿綫如姚集、長軒嶺、橫山等地遍布據點數十處，大的駐敵偽軍百餘，小的也有二、三十人。黃陂縣城是敵人的大本營，駐黃陂的敵寇司令部即設在此，統率全境丰島第三師團的一個大從。一九四一年秋長沙第二次會戰後，退駐于此的日寇曾多達一千餘人。除經常的大規模的掃蕩之外，還收買漢奸，在它的據點所在地建立偽維持會，組織偽軍，並與頑固地主掌握的封建迷信團體勾結，巩固其統治。一九四二年後更在根據地周圍建立特務組織網，專對我根據地、游擊區進行破壞、蚕食。

武漢淪陷後，在鄂東大別山深處仍龜縮着一份國民黨桂系軍隊，以李品仙、程汝懷為首約數萬人，他們怯于抗日，勇于反共。與黃陂關係最密切的是七里坪、宣化兩處頑軍，七里坪與陂安南相距咫尺，舉步可至，他們除經常大舉進攻外，還組織特務武裝與敵特勾結，專事破壞人民抗日鬥爭與根據地建設。而宣化頑軍則經常南下，繞過河口，夏店某敵人據地，窺

扰我大悟山根据地和我县北部地区。

总之，黃陂处于敌人正面戰場与根据地腹地之間，靠近武汉，而敌我頑势力又犬牙交錯，这种形势說明本地区斗争的艰苦性，复杂性。

（二）反扫蕩、反蚕食、反清乡斗争

“扫蕩”和反“扫蕩”斗争：敌伪对根据地实行“扫蕩”政策。在这一时期中，每隔十天半月便进行小規模的对局部地区的“扫蕩”，并先后于一九四一年冬、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一九四二年七月发动了三次大規模的“扫蕩”。敌人“扫蕩”的目的是要消灭我抗日武装力量，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以摧毁根据地军民生存的一切条件，仅在一九四二年的“扫蕩”中，敌人就燒毀了蔡店、姚家山两地全部或大部房屋，杀害了两名不及躲避的羣众。在敌人进攻下，人民生活日夜不安，扶老携幼上山“跑反”。

针对着敌人的“扫蕩”我們采取了反“扫蕩”政策。担任反“扫蕩”主要任务的是新四軍主力部队。他們掌握了灵活主动的游击战术，常常迂迴敌側，出敌不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使敌人的計劃屡告破产。

各次“扫蕩”中規模最大的是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敌人对大悟山根据地的九路“鐵壁合圍扫蕩”，这次“扫蕩”敌人經過长期周密計劃，出动了数万敌人。“扫蕩”开始敌人分别从姚家集，长軒岭、东阳崗（在孝感），花园（在孝感）等地出发进攻大悟山、企图一举歼灭我軍，我五师主力早有准备，到时相机轉移到敌后猛烈攻击敌人，予敌重创。敌人各路遂向平汉路、汉麻公路撤退，沿途又遭我預伏部队截击，尾击、堵击遭受严重損失，其企图完全破产。一九四三年七月敌伪两千余人在空軍配合下进行“扫蕩”，我軍奋起逐敌，曾在长岭崗等地与敌激战，取得了击毙敌伪三、四百人的輝煌胜利，使敌人一周的“扫蕩”計劃实行三日就被迫停止。

当敌人“扫蕩”时，我政府机关和地方部队則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并发动羣众坚壁清野，使敌人一无所獲。民兵在山头設立守望哨和信号树标，敌来树倒，掩护羣众上山隐蔽，使人畜很少遭受損失。

反“扫蕩”斗争有力的打击了敌人，保卫了根据地。

“蚕食”与“反蚕食”斗争：敌人对我游击区則实行蚕食政策。我們則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展开了反“蚕食”斗争。担任这一斗争任务的主要是我地方武装部队。

公路、铁路是敌人运输战略物資，調动軍队的重要交通綫。敌人沿途建立的据点是用武力控制交通綫和对游击区实行蚕食的巢穴。除旧有的公路、据点外，敌人在一九四一年新修了塔尔——柿子树店——姚集的公路，还打算修筑长堰——塔尔段公路，企图把蚕食的咀伸进我区，安插新据点，割裂我陂安南根据地。

为了打击我抗日武装，使人民屈服于其侵略淫威之下，扩大其統治范围，日寇对游击区进行了殘酷的破坏和野蛮的蹂躪。兽軍所到，奸擄燒杀，人民的耕牛財物被劫一空，生产遭受严重的破坏，妻女被污辱，亲人被杀害，黃陂人民遭受了空前的大浩劫。据陂四区两个灣子的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該两村被日寇燒毀了七間房屋，劫走了六头耕牛，四千余块銀元，两千多担稻谷。有六个归女惨遭野兽蹂躪，胡某因抗拒不从竟被寇軍投入水中淹死，六十多岁的老大媽因保护其女儿免受敌寇糟蹋，而被斬去两个指头。

但是具有光荣革命傳統的黃陂人民并没有被敌人的刺刀吓倒，他們在党的领导下向敌人

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斗争。在民兵的带动下，他们踊跃地参加了挖公路、割电线的斗争，有的常是全村老幼一齐出动。我地方游击队则担任了炸毁敌人公路、桥梁、铁路的任务，并多次伏击敌人的货车，缴获大批的物资。在我军民打击下，敌人交通经常中断，最后迫使他们停止了使用长堤——塔尔段公路。当时我抗日军民唱着这样豪迈的战歌：“打汽车、破公路、你打鬼子的腿、我打鬼子的头！打得鬼子无路走，我们的胜利在前头。”

对于敌人原有的据点，新四军五师部队曾多次出动歼灭这些据点（如姚集、长軒岭）中的敌人。对于敌人新建成或还未建立起来的据点，我们就趁他还没有站稳脚的时候加以拔除。一九四一年十月敌人在塔尔岗驻寇军六百多人，我们争取了伪维持会偷出敌人大量的手榴弹，每夜派出游击小组，以敌人的炸弹还敬敌人，扰得他们穷于应付，坐卧不宁最后被迫撤走。敌人在罗汉寺修筑碉堡也遭我县大队袭击，杀伤敌伪共二十余人。至一九四二年后我们就这样挤掉了敌人几个据点。

同时，为了防止敌人利用旧有山寨、公路路基与宽平大道修筑公路、据点，一九四一年陵安南群众在政府号召下，一致行动起来进行破路扒寨，摧毁了以塔尔岗为中心到长軒岭、王家河、磨店（在红安）三条路基共二百余里及沿途山寨。

一九四二年后，敌人大量收买了国民党特务、流氓、地头蛇、兵痞，以城关为中心，在各主要据点建立特务组织网，或明或暗的活动，对我游击区，根据地进行破坏，针对敌人各种特务的不同情况，不同的活动特点，我们采取了不同的手段，展开了反特斗争。

最初建立起来的是伪保安队特务班，我们根据其成员都不是敌伪嫡系，而其家又在根据地的情况，确定了斗争的主要策略是争取。对顽固的则予以打击。通过我们经常不断的教育，其头目戴长乐携械投诚，以后其活动转入秘密，最后终止了活动。

接着日寇宪兵队又搞起了一个东亚挺进队的特务组织，这个组织的主要成员大都是鄂东国民党特务和红帮流氓，他们破坏我们的税收，扩军，摧毁了我五湖行委员会新店，新集两乡政权。我们首先对它进行了试探争取、分化，然后通过打和拉与其下层建立了联系，并派人打入其内部，这样我们掌握了它的行动，限制了它的活动。

随后由日本人直接掌握的“洪部”特务又在我县境内狂活动。他们的总部设在麻城，成员都是一些国民党的下级军官，人数虽少但出没无常，手段毒辣，经常化装奔袭我根据地集镇及后勤机关，对我们的危害较大。后来我们通过敌翻译了解了一些他们的情况，提高了警惕，不断的给他们以军事上的打击。此外这些特务组织都还经常诱骗一些妇女、小孩，混入我根据地，刺探情报、散布谣言，以动摇我军民抗日信心。对此，我们加强了民兵岗哨，严密盘查，迫使其伎俩难以施展。

在游击区敌人还普遍地勾结了为反动地主所掌握的封建迷信团体，如陵四区、汉孝陵、武湖等地的红学，柏叶山附近的黄学，城关附近的白学等，日寇把这些团体均改称“警防团”，设“总部”加以领导。他们强迫群众加入这些组织，利用它来控制群众，甚至煽动反对抗日民主政府的暴动。此外还建立一贯道庙堂，利用落后农民迷信心理，以参加一贯道可免除灾难相号召，散布和平麻痹空气。对于这些组织中的基本群众，我们进行了争取和教育，对一般的首领进行教育和训练，对顽固的用打、捉、分化、瓦解等斗争策略，通过反复的斗争，大部份被我瓦解，或改造成为我们自己的民兵组织。这样，扫清了我们在游击区活动的障碍，使工作得以在游击区群众中更深更广地扎下了根子。

反“蠶食”是非常複雜和殘酷的鬥爭，尤其在武湖行委會所在地區和陂四區最為尖銳和激烈。由於黨的鬥爭策略的正確和依靠了羣眾，因而獲得了顯著的成績，斬斷了敵人“蠶食”的咀，擴大了游擊區。

“清鄉”和反“清鄉”鬥爭：敵人在敵占區採取了“清鄉”政策。他們收買漢奸，組織偽維持會，建立法西斯保甲制度，以強化其政治統治，並通過它對敵占區人民在經濟上進行殘酷掠奪，要錢要米供其揮霍，抽丁拉夫無惡不作。敵偽武裝經常出入四鄉，或突然包圍村鎮搜捕新四軍。敵占區的人民在敵偽漢奸統治下，飽受當亡國奴的痛苦。

針對敵人的“清鄉”，我們採用了各種鬥爭方式和鬥爭策略，進行反“清鄉”鬥爭。擔任反“清鄉”任務的主要是武裝工作隊（武工隊）；它是政府、軍隊、人民一元化的組織，也是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相結合的鬥爭形式。

我們的武工隊深入到敵占區，對偽維持會盡量的進行爭取，對死心踏地的漢奸堅決的鎮壓。如在一九四二年，我們就在長軒嶺敵據點中逮捕了敵人的翻譯官，不久又鎮壓了偽三區區長和區團長，捉服了一些漢奸，使大多數的偽維持會被我們所控制。我們利用它採取敵情報，掩蔽我們武工隊和設立在敵人據點（如姚集、長軒嶺等地）中的情報站的工作。有時我們也直接派工作人員進入偽維持會，進行偵察活動，在姚家集，我情報人員就以做生意為掩護設立了幾個情報點，定期地從偽維持會得到一些情報，我派進偽維持會的偵察員多次秘密竊聽過敵偽的軍事會議。由於有了這些可靠的耳目，敵人的一舉一動我們都可預先知道，大大有利於我們對敵鬥爭的開展。

在敵人統治的農村，我們變敵偽的保甲為兩面政權，通過他來征收愛國公糧和應付敵人。在羣眾中武工隊開展了抗日宣傳，發動他們組織起來，參加“抗日十人團”等組織，這就使我們的工作有了更廣泛的羣眾基礎。受苦難最深的敵占區的人民對敵仇恨之入骨，迫切要求參加抗日鬥爭，一經發動起來，便勇敢投入戰鬥。他們積極參加破壞公路，碾子崗的羣眾就主動的幫助過游擊隊去炸毀公路橋樑。他們冒著危險，幫助我抗日民主政府。姚家集的居民經常掩護我們的幹部橫越公路，幫助武工隊把宣傳標語貼到敵人的據點附近。雖然在敵偽的搜括下人民衣食已所剩無幾，但仍然節省糧食支援新四軍，碾子崗附近傅家大澗的人民還經常躲過敵人的耳目，把糧食直接送到根據地。通過我們的組織發動，使敵占區的人民的抗日力量得到發揮。

對敵人突然地包圍搜索或小股清鄉擾民，我們利用偽維持會出面應付，依靠羣眾掩護進行隱蔽，或相機予以打擊或消滅。敵人在柿樹店、碾子崗的搜查多次遭到游擊部隊襲擊。一九四二年日寇數名輪奸婦女，黃陂縣某區武工隊聞訊趕至，追蹤至李集（姚集北），击毙了两个敌人，自后敌人再不敢少数人出来横行霸道。我們對敵人的每一打擊都使敵占區人心大快，在人民中廣泛地流傳着，“四老闊”（暗示新四軍）神出鬼沒的故事。

我們的武工隊員還常常深入敵人據點開展宣傳，漢孝陂行政委員會就常常通過去武漢客商或派專人潛入武漢，張貼抗日標語、傳單。

反“清鄉”鬥爭的開展打擊了敵人的反動氣焰，孤立和分化了敵人，發動和組織了敵占區人民參加對敵鬥爭，增強了他們勝利的信心。

（三）根據地居民困難處境和反經濟封鎖鬥爭：

除了在軍事上、政治上的鬥爭外，在經濟上亦展開了封鎖和反封鎖的激烈鬥爭。狡猾的

敌人想尽了各种办法、企图在经济上致抗日军民于死地。他们控制了主要交通线,禁止食盐、工业品入境;每年稻麦成熟季节,发动了武装抢粮,高价收买根据地粮食;大量伪币渗入我区扰乱我金融市场;勾结奸商,高价收买我根据地的耕牛,破坏我农业生产;在武汉周围强迫群众种植罂粟,勾结流氓向根据地输入鸦片,以吸收我们的资金,并从生理上毒害我抗日群众。随着军事侵略的足迹,敌人经济掠夺的魔爪也伸了进来,日寇在长轩岭、姚家集设立了静冈,太仓两个洋行,大量套购我根据地的皮油,生猪,五金,牛皮等物质。

由于敌人的封锁、破坏,加之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取消了我新四军番号,停发薪饷,并不断侵入根据地抢粮和进行经济上的走私,这样在根据地创立初期,我抗日军民在经济上处于比较困难的境地。食盐奇缺,出现了斗米斤盐的现象,农民的耕牛农具缺乏,军用物资供应困难,为了减轻人民生活负担,新四军的干部,战士生活降低到最低的水平。

为了解决困难,渡过难关,抗日民主政府一方面发动群众提高农付业生产,同时展开了反经济封锁与破坏的斗争。我们发放贷款,动员农民到河南息县(国民党区)等地贩回大量食盐,解决了食盐供应困难;组织了大批有经验的行商,设法通过敌人封锁,到武汉运回大批商品;武装保卫秋收,组织农民抢收、抢打,击败敌顽的抢粮,并严厉禁止粮食出口;抵制伪币,稳定了市场。一九四三年夏季黄陂县手枪队,袭击了敌人的两个洋行,缴获了全部物资。打击奸商、坏人,反对敌人的放毒和盗运耕牛的斗争在五湖行委会所辖地区,取得显著成绩。武湖是敌人从汉口运毒品到黄陂、黄安、大悟的主要交通线,通过我们雷厉风行的取缔,对重犯加以镇压,对轻犯教育释放,烟贩、烟馆很快绝迹。对于盗运耕牛,我们组织了民兵严加防范,破获了徐林乡的牛贩集团,保卫了农业生产。在经济战线上斗争的胜利,使我们渡过了困难时期;通过以后的大生产运动,抗日军民经济上的困难获得了根本解决。

(四) 国民党反共逆流的被击退。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就严重的存在着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投降、倒退,分裂和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抗战、团结、进步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从一九三九年——一九四三年国民党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黄陂根据地开辟后,鄂东国民党顽军每年就要发动两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企图消灭人民抗日力量。对此,我们正确掌握了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对顽固派进行了胜利的斗争。

一九四一年九月,顽军刘和昇部的八个团从宣化移师南下,以攻取黄陂县城为名,向我军借路,新四军答复其要求,并主动派医药担架支援。顽军入境后即撕下了假面具向我军进攻,新四军第五师奉命还击。在政治上一方面通过开明士绅潘怡如等到鄂东行署去质问;另方面向大后方发出通电,向全国人民揭穿其阴谋。在根据地,我们在塔尔岗等地召开群众大会,对国民党顽军的阴谋进行揭露,以教育群众。这样我们在军事上揭露了敌人,政治上使顽固派在群众中彻底孤立。由于群众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面目,在以后反击顽军的进攻中,群众都主动加入战斗。一九四二年六月在数百群众参战与支持下,我军又击败了来至七里坪顽军的进攻,击毙顽军数百人。

一九四二年十月,宣化顽军南下侵占黄陂县中心地区蔡店、梅店一带,我军政机关暂时转移;这时蔡店柏叶山附近的顽固地主、恶霸、黄学首领李宗一,马八义等在大地主胡康民指使下,策动了蓄谋已久的“柏叶事变”,杀害了我区长杜崇浩等四人,并企图投靠国民党顽军。事变后,根据地的顽固地主乘机向我们发起进攻,歪曲事实的真相,攻击党在根据地

的各項政策。黨和民主政府對首惡兇犯實行堅決鎮壓，除畏罪潛逃敵區的外，都依法處決。同時在縣參議會上，團結中間勢力，對頑固地主進行說理鬥爭，孤立與揭露了頑固地主，擊退了他們的進攻，教育了羣眾。“柏葉事變”是國民黨反共聲浪在根據地的反響。

一九四三年十月正值國民黨第三次反共高潮，鄂東頑軍一千餘人，進攻陂安南長堰，襲擊我們的醫院，殺害我們的幹部，我地方武裝與民兵一千餘人奮起抵抗，擊退了他們的進攻，此後頑軍不敢再輕舉妄動。

國民黨頑固派除了正面進攻外，還派了大批特務進行破壞。其中危害最大的是桂系特務，活動在陂四區長安集一帶，與國民黨第五戰區相呼應，專門對付共產黨，進行反共宣傳，監視羣眾活動，企圖切斷我們黃孝公路南北聯繫，另外一支武裝特務——特別行動隊（簡稱別動隊），共有一百二十餘人，活動在武湖，長堰一帶，專門進行暗殺、破壞和經濟走私，他們都暗中與敵特勾結，並又與地方封建勢力、封建迷信團體、流氓、地痞結成一体。對於頑特，我們進行了有策略的鬥爭。在陂四區發動眾控訴頑特的罪行，要羣眾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在羣眾的鬥爭下，頑特被趕走了。在陂安南與武湖，我們對別動隊鬥爭的口號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除個別極頑固的外，不輕易鎮壓，多捉多放，爭取與他們建立一般聯繫，這樣限制了他們的活動，一九四三年就基本上絕跡了。

堅持鬥爭的過程亦是我們武裝成長的過程，鬥爭中我們亦受到了最好的鍛煉，發展了自己的武裝力量。武湖行委會縣大隊不到一年時間就由原來的八十餘人發展到二百餘人，陂安南縣大隊由建立時的四、五條破槍發展到四、五百餘人。各區的武裝也大有發展，發展最迅速的陂四區，在短時期內，建立了一個獨立營，且都在鬥爭中取得了豐富的鬥爭的經驗。黨非常注意地方武裝的成長。一九四二年陂孝指揮部成立了教導隊，在縣大隊中抽調優秀骨幹百餘人加以訓練培養，以充實各級武裝領導，這樣軍隊的政治軍事素養均得到了大大的提高。民兵是羣眾性的勞武結合的生產戰鬥組織。隨着羣眾覺悟的提高，尤其是通過組大運動，民兵組織不斷的健全、發展，配備了堅強的幹部，加強了領導，同時也加強了基干民兵，造成了一支骨幹力量，清洗了壞分子，純潔了組織。在鬥爭中民兵起了巨大的作用，他們擔負着站崗放哨、偵察和遞送情報、保衛生產、破壞敵人交通，以及作戰中的運輸、擔架等重要任務；有力的配合了地方和主力部隊，使對敵的游擊戰爭，得到了在廣泛、深入的開展。

各級地方武裝原來都是新四軍中抽調骨幹建立的，而地方武裝又是正規部隊的後備軍，它的發展直接關係到新四軍的發展。通過“升級”的方式，即由民兵——區中隊——縣大隊——新四軍，從下而上逐級抽調補充方法，自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三年在黃陂，陂安南，武湖在三縣的縣大隊中三次輸送優秀分子至新四軍，每次每縣均在四五十人以上，提供了新四軍的兵源與幹部來源。

由於黨的正確領導，貫徹了軍隊與民眾結合，正規軍、地方部隊與民兵結合的對敵鬥爭的羣眾路線，使我軍在戰鬥中發揮了高度的積極性、主動性，戰勝了敵、頑的夾擊，保存了自己，使敵人侷促在小塊地區內一籌莫展。一九四三年十月以後，敵、頑大規模的進攻大大減少了，根據地大大穩固，並為以後根據地的大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二、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

（一）漢孝陂、武湖行政委員會的建立。行政區域的變更。基層政權的加強。

汉孝陂的开闢：汉孝陂主要是汉阳、孝感、黄陂三县相联系处的三角地带，紧靠武汉市，是鄂豫皖区对敌斗争的前哨。它的开闢经历了一段艰难曲折的过程：一九四一年，新四军第五师十三旅即根据中央“扩大游击区，巩固根据地”的方针着手开闢。最初派去的手枪队，因不明敌情，不了解这里为顽固地主所掌握的红学的情况，不久在汉阳、黄陂边境遭红学暗算而失败。接着又派了一个营的兵力，通过对红学军事上的打击，政治上的争取，终于在一九四二年建立了包括汉阳、孝感、黄陂、汉川、云梦五县部分地区的汉孝陂行政委员会。党内设县委，建立了一支二百人的武装，活动中心在黄陂的黄花涝、汉阳的茅庙集一带。一九四二年打垮了汉阳猪兴山的汪步清伪军后，活动范围更形扩大。它的活动主要是突破敌人的封锁；到汉口运大批工业品，支援根据地建设；在武汉周围甚至深入武汉市区进行抗日宣传，扩大政治影响，武装部队经常出没于汉水两岸，截击敌人的运输船只。自汉孝陂开闢至抗战胜利，它一直屹立于武汉外围，威胁着敌人的心脏。

武湖行政委员会的建立：为了发展游击区，加强对这个地区的游击战争的领导和扩大税收范围，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六两区合并为二、六办事处，旋即改为武湖行委会，辖汉麻公路以北部分地区及公路南全部地区。党内设县委，直属鄂东地委领导，建立了一支八十余人的武装（后发展至两百余人）。行委会成立以后，首先进行巩固工作，继续扩大武装，争取伪政权，对敌斗争以分化瓦解为主。以后游击区不断向西南扩大。至一九四三年四月，新四军部队击败了把持吴店一带的封建红学，迫使其首领屈服，清除了障碍。新四军在群众中的威望大大提高，打开了这一地区的工作局面。此后，我游击范围，南达武汉近郊，西抵黄陂城下，扩大和巩固了根据地。

从地理位置来看，武湖南接武汉，靠新洲仓子铺敌人，东北近黄安敌顽巢穴，中间横以黄孝公路。从地形上看，除路北15%的丘陵地带外，其余都是平原湖泊，这里是敌伪顽军事进攻常到之处，是特务活动和经济掠夺的主要地区。刚去开闢时，这里的地方政权是敌我顽三面的政权，情况复杂，形势险要，成为敌我顽斗争的焦点。

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抗日军民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巧妙地运用了各种斗争方式，打败了敌顽特务，战胜了经济封锁和破坏，改造三面政权为我方政权。我们的游击队活动在武通口、长江北岸一带，汉麻公路敌人运输，常遭我两侧军民袭击。我们的税收范围，可达黄陂城内，武汉市郊。武湖是我们对敌斗争的又一个前哨，而敌则视之为心腹大患。

一九四四年，由于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了对敌斗争的胜利，敌人进行了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守其最后的阵地，加强了对县南的军事控制。我党为了集中领导，打击敌人，武湖行委会合并入陂安南。

汉孝陂、武湖行委会，是我根据地伸向敌人的两只铁拳，它有力地牵制了敌人，成为根据地可靠的屏障。

行政区划的变更：汉孝陂和武湖行委会建立之后，为了适应斗争形势，一九四二年十月，根据交通方便、工作基础和工作发展的需要，将黄陂的汉宜公路河汉段以东地区，黄安、黄冈之一部分合并成立黄安县（习惯称为陂安南），党内设陂安南县委，以黄安交界处之马鞍山洼为活动中心。而黄陂县的活动中心就转移到蔡店去了。

自此以后，原黄陂县就被划分属黄陂、陂安南、武湖、汉孝陂四个县级行政机构管辖。

基层政权的加强：根据地的羣众在党的教育下，通过斗争，觉悟不断提高，并涌现出了大批积极分子。这样，在一九四二年前后，以民主的“投豆”选举方式，选举出一批新的干部，以代替原来留用的旧联保主任和保甲长，加强了基层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

一九四三年秋季武装斗争的胜利，党的各项政策的贯彻，根据地渡过了最困难的年月，即将开始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形势的即将到来，使原来的政权组织形式显得不适合了。为了更好地领导斗争和开展各项工作，进行试点试验，创造经验，推广全面；为了培养干部，为开辟新区作好准备，抗日民主政府将原来基层政权的行政区划和组织形式进行了调整。在本区改设中心乡（相当区），一个中心乡领导若干小乡，边远区则仍保持区的建制。党内区和中心乡设区委，乡设分区委或支部。当时黄陂县辖塔城、高望、文治三个中心乡，河姚、陂四两区。陂安南所轄黄陂地区有青品、兰馥、长裂、长岭四个中心乡及陂城区。

基层政权的加强，使党能更好的领导即将到来的组织羣众大多数运动，同时为根据地的发展准备了干部。至一九四四年冬，根据地扩大并巩固了，才又恢复原来区的形式。

（二）减租、减息及各项政策的贯彻

减租减息运动：

土地问题始终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土地革命时期鄂豫皖根据地遭国民党反动派四次“围剿”后，我红军主力转移四川，白色恐怖又笼罩根据地。黄陂与其他地区一样，封建地主又重新霸占农民的土地，征收高额地租及其他名目繁多的各种租税，对农民实行残酷的压迫与剥削。据靖安乡的统计，全乡占6.71%的地主和富农，占有土地45.28%，占93.29%的广大贫苦农民，只占土地54.72%。如将地主在外乡出租的土地计算在内，计占土地达80%以上。这种极不合理的土地占有情况，就是农民被压迫被剥削的根源。地租情况一般为50%，个别地区高达60—70%，尚有“吃新”、“清庄酒”、“脚力钱”、“打谷饭”、“犁尾巴”等数不胜数的额外剥削。农村的高利贷利息也高得吓人，月息由10%到20%。加上国民党无止境的抽丁抽税，沦陷区敌人的大肆虏掠烧杀破坏，耕牛农具几乎每村都感到奇缺。因此，农业生产严重遭到破坏，农村经济呈现一片凋蔽景象，广大农民生活处于朝不保夕的十分悲惨的境地。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地位，为了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组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因此，这个时期党的土地政策就不能沿用土地革命时期的消灭封建土地制度的政策。抗日民主政府的土地政策是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一方面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一般从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利息以不减到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另一方面又规定农民交租交息，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不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因清算老账而无偿收回典借的土地。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黄陂重建民主县政府，颁布了施政纲领，从此开始了减租减息斗争。由于当时形势动荡不安，某些基层干部认为减租减息是小事，未能很好贯彻“双减”的政策法令，羣众要求也得不到支持。某些地区即使实行也多半带有浓厚的“试验”性质。许多农民把减租看作是党和政府的“恩赐”，未意识到是他们自己斗争的胜利果实。正因为羣众未充分发动起来，干部也存在纯经济观点，使得这一时期的减租减息运动不深不透，地主敢于进行反扑，叫嚣“干部搞得过火”，并造谣污蔑减租是“暗共明不共”，威胁农民“新四军走了，再算陈账”、“谁吃了黄铜就要吐生漆”。因此好些农民将减下的租谷又暗地送还

給地主，形成明減暗不減。这时，黃陂大部分地区減租均流于形式，工作存在許多缺点。

一九四二年八月間，在县委领导下，在蔡店楊家河召开临时参議會，边区党委民运部长吳祖貽同志在会上作了關於減租減息政策的報告。这年冬，边区頒布了減租減息办法，县政府随即举办了干部訓練班，抽調各乡干部約百余人进行集訓。从此全县逐步开展轟轟烈烈的羣众性的減租減息运动。当时以陂五区官潭乡为重点，在县委書記任士舜同志亲自掌握下，深入发动羣众，交待政策，打消羣众种种顧慮，召开羣众大会与地主进行面对面的摆事实講道理的斗争。首先集中力量突破大地主鮑翊湯家，結果在鮑家退出租谷六百多石，全乡退出押金值五百多石谷子的边币，大大鼓舞了羣众的积极性，并帶動了全县工作得以順利展开，其他地区一般中小地主紛紛表示愿意遵守民主政府的政策法令。由于我們充分发动了羣众，正确执行了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按不同情况分別对待，所以一九四三年以后的減租运动进行得較彻底，取得巨大成績。經過減租減息运动，改善了农民生活，發揮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使得农民在物質上加强了对敌斗争的支援。同时在运动中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觉悟，农救会得到迅速发展，并湧現一批农民积极分子，参加基层政权，增强了进步力量，而一些旧乡保人員也在运动中得到改造。这样就在物質上和組織上为大生产运动創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保障了地主的土地收益，阶级关系得到調整，有利于巩固抗日民族統一战綫。但双減运动仍存在着缺点，羣众发动还不够深透，有的租額偏低，有的地区也推行得不彻底。

一九四三年以后成立了区乡保各級評租委员会，由农救会主任、区、乡长、財經、妇救会、民兵、文教界、老农、开明士紳等各方面代表組成，每到收割稻麦季节，亲到田間查看，按实际收成协商評定合理租額，以后每年減租就制度化了。

在开展減租減息运动的同时，积极貫徹了党的各項政策，主要的是以下几項政策：

精兵簡政政策：

为了克服由于敌人的封鎖而遭致的物質上的严重困难，使战争机构适应当前的战争情况，也就是要解决魚大水小的矛盾，一九四二年中央号召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精兵簡政，精簡过于龐大的战争机构，以減少非生产人員，節約开支，減輕人民的負担，并輕装战斗，發揮坚强的战斗力。

稅收政策：

民主政府的稅收方針是按收入多少規定納稅数目，一切有收入的人民，除最貧苦者得以免征外，80%以上居民，不論工人农民都要納稅，不应將負担完全放在地主与資本家身上。

稅收分农业稅和商业稅两大类。

农业稅的政策起初是按亩平均征收，一九四二年起改为累进稅。公粮按收成多少，田賦按土地多少累进計征，这是为了更好地貫徹多收入多納稅的原則，力求做到合理負担。工作开展是依靠貧僱农，彻底清查田亩，定出等則，分特上等、上等、中等、下等、特下等五等，分別等則定出稅率，每人平均有一斗田的为起征点，公粮由地主、佃戶三七分担（地主七佃戶三），田賦由土地所有者交納。

在征收农业稅的过程中，遭到地主富农的种种阻撓和破坏，特別是瞒田現象最为严重，并賄賂我乡保基层干部，但由于我們坚决依靠了貧僱农，彻底揭穿了地富的种种花样，并向他們的頑强破坏行为进行了坚决的說理斗争，使农业稅收政策得以貫徹。

商業稅分行商和座商兩種。座商按資金多少分等級征收，行商稅率按商品種類而定，為根據地最需要又最缺乏的物質如食鹽、棉花及其他軍用物資等則少征或免稅，迷信品則課重稅。在交通要隘設稅卡，一次征收。邊區的關稅政策是保護正當的商業經營，嚴禁敵偽奸商販毒走私，控制邊區物資外流，對邊區需要的物資如運進生產資料和日用品特別是食鹽、耕牛等予以保護並給予方便。關稅成為經濟上對敵鬥爭的強有力的工具。

由於民主政府正確執行了農業和商業稅收政策，取得很大成績，一方面增加了財政收入，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當時的財政困難，另一方面做到了合理負擔公糧和田賦，也刺激了農民的生計積極性，對提高農業生產起了一定作用。商稅政策則打擊了奸商投機倒把，保護了正當的商業經營，使根據地的商業得到發展。

經濟政策：

民主政府的經濟政策是和積極發展工農業和商品流通。政府經營的國營企業只當作整個企業的一部分，並獎勵民營企業，還吸引外地資本家到本地來開辦實業，以達到自給自足的目的。關稅政策、貨幣政策和发展農工商業的基本方針相適合。

一九四三年冬，根據地大張旗鼓地開展組織羣眾大多數運動，農付業和工商業都得到迅速的發展，徹底粉碎了敵人的經濟封鎖，基本做到自給自足。貨幣政策：是禁止使用偽幣，限制法幣內流，確定邊幣為唯一合法流通的貨幣。邊幣以實物定出價值，這樣澄清了金融混亂現象，邊幣信用日益提高，使用範圍亦逐步擴大。至抗戰後期，邊幣能秘密流通至漢口這樣的中心城市，使得邊區物價相當穩定，對繁榮經濟安定人民生活起了十分良好的作用。

勞動政策：

民主政府的勞動政策是必須改良工人生活，發揮工人的抗日積極性，但加薪減時均不應過多。在某些生產部門允許實行十小時工作制，其他生產部門按情況規定。勞資訂立契約後，工人必須遵守勞動紀律，使資本家有利可圖。黃陂根據地工廠如修械廠、被服廠、皮革廠等與軍事相關的為五師創辦，紡織廠、煙廠等則由縣政府與資本家合辦，純私人興辦的工廠為數甚少。各廠工人工作時間長短不一，由八至十小時，星期天按例假休息，工作特忙時需要加班則同時加薪。工人工資有純薪金制、工資加補助、工廠包伙食外加工資等數種。薪金制中又分計時工資和計件工資。害病期間工資照發，家庭困難另有補助，殘廢及死亡還有甚優厚的優撫金。工人工資得到法律保障，一般工人生活水平都過得較好，一人工作能負擔一家數口的生活。

文化教育政策：

民主政府的文化教育政策是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眾的抗日的知識技能和民族自尊心為中心，容許資產階級的教育家、文化人、記者、技朮人員來根據地和我們合作辦學、辦報、做事，吸收較有抗日積極性的知識分子加以訓練，給他們參加軍隊工作、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的機會。根據地還要建立了印刷廠，出版書報，尽可能開辦大規模的幹部學校。

根據地建立前，儘管黃陂的文教事業較偏僻地區的縣份發達，但仍是落後的，全縣只縣城有一所縣立中學，學生多為地富資本家子弟，鄉村小學也不普遍，據調查當時較為富裕的靖安鄉只有三所私塾小學，學生總共二——三十人。勞動人民的貧困化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根據地建立後，改變了過去的落後狀態。一九四一年，在長生庵成立黃陂中學，由兩個班增至六個班，第一期畢業生達九十人。隨後在柿子樹店成立陂安南中學，有教師十餘人，

學生二百多人。老師月薪三石米，學生享有助學金。每鄉均建立小學，各村灣逐步開辦了夜校，勞動人民掀起了學習文化的高潮。此外，還開辦了各種類型的訓練班，以培養行政和軍事幹部。一九四二年設立一所印書館，印刷文件報紙課本等。儘管此時期環境較為動盪，在黨的正確領導下的根據地的文教事業，仍取得一定成績，為以後大發展奠定了基礎。

第四節 人民抗日力量的大發展，從局部反攻到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一九四三年十月——一九四五年八月）

一、整風運動：

整風運動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教育運動，其目的在於用馬列主義思想批判和清除非無產階級思想，從而提高全黨和幹部的思想水平和理論水平，增強黨的團結，從組織上思想上保證黨中央正確路線和政策的貫徹。

一九四二年黨中央決定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當時我黨已經是一個久經革命鬥爭考驗的布爾什維克的政黨，但仍存在着許多缺點。從豫鄂邊區看，抗日戰爭時發展了大批知識分子和農民成分的新黨員，他們的小資產階級意識不僅未得到徹底的改造，而且還相當嚴重的存在着，給黨的各項工作帶來許多困難和危害。首先他們的政策水平不高，例如對民主政府減租減息政策認識不足，黃陂有個幹部對羣眾正確的減租要求認為是小事，表示“概不負責”。許多幹部對充分發動羣眾建設根據地的重大意義認識不足。其次幹部的理論水平不高，對學習理論也缺乏正確認識，還有“我不學理論，上級叫我干啥就干啥”的糊塗論調。在思想上也嚴重存在宗派主義，某些黨員把“三三制”政權了解成為清一色，不願意和黨外人士特別是出身不好的人共事。自高自大，鬧不團結的現象也存在着。在不少新老幹部之間，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之間還存在着某些隔閡。主觀主義在工作中的表現也不是個別的，所有這些都給黨的工作帶來損失。整風運動就是要整掉這種三風不正的現象。

邊區直接中央指示信，於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即在各地陸續開始整風。邊區，地委及縣一級機關都曾集中部分幹部進行過整風，開了不少大大小小的討論會，但直到一九四三年冬以前，並未掀起整風運動的熱潮，因而成效甚少。這一方面是由於一時環境相當動盪不安，各機關部隊活動較為分散，不容易集中起來以較長時間來進行整風。同時這一時期根據地基本上處於發展狀態，在軍事上政治上各項政策的實施上有許多工作迫切要做，要求我們用較多的力量放在發展的工作上，因此在客觀上給整風帶來不少困難。另一方面在主觀上對整風的重大意義認識不足，未按邊區特點訂出切實可行的計劃。

一九四三年冬，邊區黨委作出關於徹底開展整風的決定。這時邊區形勢正進入新的階段，對敵頑的鬥爭已取得巨大勝利，根據地處於相對穩定狀態。大規模的擴展根據地的階段已經告一段落，形勢要求我們集中更多的力量投入鞏固內部的工作，迅速提高幹部的理論水平政治思想水平和工作方法，以適應客觀形勢發展的需要。同時，這一時期我們更接近最後勝利，更加要求我們內部加強團結，以便發揮我們的戰鬥力量，而整風又是鞏固工作的中心環節，因此邊區黨委決定於此時開展全面的徹底的整風運動是非常及時而正確的。整風內容按中央及邊區黨委指示集中整頓學風中的主觀主義，黨風中的宗派主義和文風中的黨八股。其

中以整頓黨風為主，加強階級教育，徹底肅清國民的影響，以毛主席的“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等三篇報告和鄭位三同志的“民主作風和革命主義”的文章和解放日報的有關社論為主要學習文件。邊區及地委成立學委會和分會，下設中心小組及若干普通小組以領導縣一級機關的整風，區級以上幹部集中於縣整風，一般區鄉幹部則在各地進行，要求以整風為主而與日常工作結合起來，對各單位部門存在的突出問題定為整風的中心課題，力求聯繫實際解決問題，並充分發揚民主，在個人檢查的基礎上相互展開批評，最後每人都寫思想總結。

由於黨的正確領導，負責幹部帶頭檢查，採取了適合邊區特點的方法，即一面整風，一面工作，以整風帶動工作，不斷糾正運動中的缺點和錯誤，使得整風運動取得巨大成績。首先廣大的黨員和幹部的作風有了顯著的轉變，思想上進一步明確了黨的羣眾路線，加強了羣眾觀點，黨羣、干羣和軍民關係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為開展大生產運動作了思想上的準備。另一方面是提高了廣大的黨員和幹部的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明確了加強學習改造思想和端正思想方法的嚴重意義，使得上下級之間，新老幹部之間，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之間的關係更加密切，全黨在思想上達到空前未有的團結，為爭取抗戰勝利打下了思想基礎。同時通過整風湧現一批積極分子參加了黨和政權組織。

二、組織羣眾大多數和大生產運動：

（一）組織羣眾大多數大力發展農付業生產。

組織羣眾大多數運動（下稱“組大”）是在充分發動羣眾的基礎上開展以生產為中心的生產軍事教育三結合的羣眾運動。其目的是為了發動羣眾，大力發展生產，從經濟上做到自給自足，並提高羣眾的階級覺悟，普遍發展羣眾性的武裝力量，以便進一步地鞏固根據地，加速勝利的到來。

黃陂的“組大”運動始於一九四三年冬。在此以前，邊區黨委為開展“組大”做了一些準備工作，曾組織檢查團深入各地檢查各項政策貫徹的情況，以便為“組大”找到切實可行的方法。但是這一時期基本上是根據地的開辟和擴展時期，黨的工作著重於軍事和強化政權方面，而在這些工作中又偏重於搞上層，對充分發動基本羣眾，大力發展生產，從物質上牢固的建設根據地的思想不夠明確，以致農救會的作用未得到充分發揮，邊區的準備工作也只停留在調查研究上，未制訂有行動計劃付諸實施。一九四三年秋後，中央派鄭位三同志到邊區工作，傳達了中央關於“發展生產保障供給”的經濟方針及在邊區開展大生產運動的指示，他在報告中指出必須充分發動羣眾，領導羣眾大搞生產，只有這樣邊區才能得到鞏固，於是邊區黨委作出決定，在全邊區開展以生產為中心的“組大”運動。當時的形勢對我們也有利得多，軍事上已取得了反掃蕩，反蠶食反清鄉鬥爭的輝煌勝利，環境較前安定；反經濟封鎖也取得良好的成績，根據地已勝利渡過了艱難時期；由於貫徹了各項政策，民主政權也較前大為強固了，特別是一九四二年冬以來，開展了大規模的減租減息運動，羣眾覺悟大為提高，物質生活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為大生產作了某些準備，加上整風運動的全面開展，在思想上對“組大”運動也起了推動作用。因此這時開展“組大”不僅有可能，而且還有許多有利條件。

“組大”運動就是廣泛深入的發動羣眾參加農救會，通過農救會直接領導羣眾大搞生

产，发展群众武装及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教育活动。三者以大生产为中心环节，这也就是“组大”的首要任务，大生产又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因农业是解放区的主要经济成分，只有农业发展了，才能解决广大的农民生活，才能保证军队衣食的供给，才能推动工商业的发展，并可用农产品换回我们需要的物资。只有经济事业发展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根据地才有巩固的物质基础，同时大搞生产也锻炼了我们的部队和改造了干部。

抗日战争时期的生产是在战争环境中进行的，而生产又是为了支援抗战。因此“组大”的另一任务是加强群众性的武装力量，以便更加发挥全民抗日的的作用，这一任务具体表现在整顿民兵组织。“组大”运动中，涌现出了大批的农民积极分子参加民兵行列，清洗了一批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坏分子，换上了坚强的领导骨干，并挑选一批成分好阶级觉悟高的组织骨干民兵，从而健全了民兵组织，大大加强了民兵的战斗力。民兵是一种劳武结合的組織形式，是我根据地群众的优良传统，抗日战争时期更加发挥了这一组织的作用。

“组大”的第三个任务是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教育活动。由农救会组织和领导群众办教育、学文化。由于生产的发展，必然推动文教事业的发展，而文教事业又是为抗日战争和大生产服务的，因此反过来又对发展生产和对敌斗争起很大的作用。

黄陂是边区重点县之一，从边区到县自上而下的派遣了干部深入各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大力宣传党的政策，通过扎根串连，广泛的发动农民参加农救会。边区主席许子威同志就曾亲率数十名干部深入黄陂塔西乡搞试点，随后运动在全县范围铺开。在这运动的过程中，一些顽固地主从中进行阻挠破坏，恐吓群众说“莫要高兴早了，将来总要共产的”，要挟干部要“眼光放远些，工作要和平些，还有半个天是别人的（指国民党）”但是在群众的坚决斗争下，顽固派的阴谋诡计彻底失败了，“组大”运动在全县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

黄陂县政府对发展农业生产作了如下措施：

一、把个体农民组织起来，毛主席根据列宁论合作制理论并结合我国农民旧有的劳动互助习惯和经验，指出在解放区要发展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劳动互助组织，并指出这是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唯一道路。黄陂在农救会的号召领导下，以甲为单位普遍组织了换工队，有人工互换，牛工互换或人工牛工互换等形式，换工队订出生产计划，解决了农忙季节人少工多而又时间紧迫的矛盾，为解放后组织互助合作扎下了根。

二、干部直接参加生产，与群众三同。县长任士舜同志亲手种田种菜，有些乡政府的办公室都搬到田畈里，一面办公，一面和群众共同劳动。当时县政府的干部在驻地附近还开了六亩多荒地。由于干部直接参加生产，一方面可自给一部分粮食蔬菜；另一方面也鼓舞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三、发放农贷，奖励开荒。政府每年都发放大量农业贷款，帮助群众解决农业生产问题，春耕冬播时贷款给农民购买耕牛农具种子肥料等，青黄不接时给困难户发放粮食贷款，秋后按粮价折实还贷。此外还发放水利贷款，致于发展农业生产则随时可贷款。一九四四年本县贷给一个乡就达十五万元，这样严重地打击农村高利贷，对解决农民生活、发展农业生产起很大作用。

政府为奖励开荒。规定生荒三年不纳粮，熟荒一年不纳粮。区乡干部带头和群众一起开荒，仅高望乡就开了六百多亩荒地，使粮食产量大为增加。

四、領導羣眾防澇抗旱，大力興修水利，挖塘、筑堤、開渠等。僅高望鄉就修了三百多口塘，五十多個堰，甘棠區修水塘五百多個，在長江最大的大塘角水塘可灌溉百多亩農田，這樣就有力的抵抗了水旱災害，保證了農業生產的大丰收。

五、推廣選種施肥下種等先進的耕作經驗和技術，獎勵勞模，號召換工隊、家庭訂生產計劃。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四年每年召開勞模大會，會上總結交流深耕細作施肥選種的經驗，獎給勞模以耕牛犁耙鋤頭等農具及毛巾牙膏等日用品，大大鼓舞了羣眾的生產情緒推動了生產，許多家庭具體地訂了生產計劃。

在發展農業生產的同時，政府也十分注意發展付業生產，當時作出較大成績的是組織挑販隊及織布業。由政府通過農救會將解放區生產的紙煙及其他農產品組織挑販隊運到敵占區或根據地的外圍區，並換回根據地軍民所需要的食鹽棉花油料及其他軍用物資等，挑販業獲利甚厚，因而發展很快。如塔西鄉二保八十三戶經營付業，其中挑販業即占33戶，譚家稻場七戶中有六戶是挑販，大大改善了羣眾生活。在紡織業方面，政府把外地運回的棉花通過農救會貸給羣眾紡織，或讓羣眾把自己織好的布兌換棉花。這樣往復循環，紡織者也可獲得甚大的利潤。此外，付業生產還有餵家畜、雞鴨、養魚、養羊等，收入也不少。由於正確貫徹了中央發展經濟的方針，並緊緊依靠羣眾，充分發揮羣眾的積極性，加上政府作出了上述幾方面的有效措施，使得解放區的農付業生產得到迅速的發展，耕地面積大為擴大，糧食收穫量空前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有顯著的提高，許多農民半年糠菜半年糧的生活已一去不返了，廣大解放區呈現一片豐衣足食的景象。

（二）小型工廠的興建，商業的繁榮：

農付業大發展的結果又推動了工業大發展。

一九三四年邊區工廠如雨后春筍般的興建起來，計有修械廠、電料廠、被服廠、紙煙廠、皮革廠、硝皮廠、造紙廠、肥皂廠等大小工廠數十個，布于蔡店，塔耳崗，長嶺一帶，其中有直屬五師經營的被服廠、修械廠、造紙廠等。有縣財政科與私人合辦的，如民生煙草公司。合營後該公司得到迅速擴大，到一九四四年夏已發展到百餘工人，設捲煙、包煙、裁紙三個分廠，產品除供給邊區人民需要外，還運銷鄂南，安陸、應山、武漢、天門、漢川、沔陽等地，每月利潤可達四千餘元。被服廠也有百多個縫紉工人，四十餘架縫紉機，半月時間即可生產一個團所需要的全部被服。一般工廠有十餘人至數十人不等。修械廠不但可以修理槍炮，還可製造炸彈，許多軍需品能做到自給。某些生活日用品，如紙煙肥皂等，除自給外還有相當數量外銷。

工農業的發展，又促進了商業的繁榮。一九四四年春邊區物資統制局在蔡店開設德興和謙益兩個公行，收購食鹽、棉花、油料、硫化青、燒碱等工業原料及邊區所需要的物資，再通過各區的供銷合作社及部分行商分銷到邊區各地，並貸款給挑販和行商到敵偽區販回各種物資，按低於本地售價5%賣給公行，挑販獲利很大，對活躍商業起了很大的作用。公行每天掛出牌價，對奸商抬價予以嚴重打擊。此外，農村普遍建立供銷合作社，有政府開辦的，也有羣眾集股合辦的，合作社的宗旨是協助政府進行物資統制，調劑產銷，穩定物價，如十四旅後勤部於塔耳崗開設的供銷合作社，大量供應食鹽、食油、土花布、紙張、肥皂、牙膏等日常生活必需品，農民可用實物進行等價交換，滿足了羣眾的需要，羣眾反映非常滿意。合作社確實起到了促進城鄉物資交流繁榮邊區經濟的作用。商業也把家庭手工紡織業和公行聯繫起

来，公行从外地購回棉花，貸給手紡織者，他們織成布后又从公行換回棉花，从中獲取加工費。

此外，边区商业的繁荣还表现在兴起了許多新集鎮。原有集鎮也得到发展和扩大，例如蔡店区的双河集，原来仅有一間小飯店，为客商过路休息的小站，后来发展成为有30余家店舖的边区商业的小轉运站，其中有烟舖、米行。总之，工农业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商业的繁荣反过来又推动了工农业的进一步发展，解放区的工商业呈現一片欣欣向荣景象。这里值得提出的是有公行和合作社的存在，对稳定物价，保証解放区的物资供应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三)拥政爱民和拥軍优抗运动。

为了使党、政、軍、民打成一片，以利于开展对敌斗争和大生产运动，中央指示各地根据地应于一九四四年阴历正月普遍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拥政爱民和拥軍优抗的羣众运动。边区党委根据中央指示結合边区情况作出决定，指出运动的主要方面是拥軍 爱民而以 爱民为重点，决定的要点：一、在部队、机关中广泛深入开展宣传教育，并与动员和组织人民大多数和政治教育联系起来。要軍队中强调爱护根据地，树立羣众观点。地方党政系統中，着重整顿官僚主义作风。机关干部、部队抽出一定时间帮助羣众生产，教育干部，軍队加强劳动观点。三、妥善解决夫役問題。向羣众宣傳拥护政府，加强抗战胜利信心。四、拥軍工作以优抗为重点。

一九四四年春节期间，黄陂根据地各区配合“組大”运动，大張旗鼓地开展拥政爱民、拥軍优抗运动。黄陂地方部队檢查了执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情况，并与政权机关在驻地召开了軍民联欢与拥政爱民大会。县政府于春节期间向各界人士及地方耆老請酒拜年；县指揮部动员全体指战員深入羣众，帮助他們生产，县、区、乡各级干部与羣众一起挖塘堰。羣众受到一次极为实际、深刻的政治教育，他們十分感激，党政軍对他們的关怀与爱护，自动发起慰劳部队和抗屬，贈送酒肉、礼品。妇女們搶着替部队洗衣补袜，青壯年自动要求送夫役。党政軍民关系大为改善，直接推动了当时的大生产运动。

(四)文教事业的大发展。

工农业的大发展，也促进了文教事业的大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迫切要求学习文化，以求摆脱祖祖輩輩睜眼睛的痛苦。一九四三年以后，根据地农村掀起了学文化的高潮。当时政府从两方面着手发展文教事业，一方面是改造原有的旧学校，把灌輸封建文化的旧私塾改造成为新型的小学校。主要是彻底改变旧有的教学內容，編出一套以灌輸抗日爱国思想及生产知識为中心內容的新課本代替原来的四書五經和古文。同时相应地改革了教学法，力求教育为抗日和大生产服务。另一方面是大力开办新学校，公家办学与羣众办学同时并举。有些学校經費来源于祖庙产，不足由政府补助。由于政府采取了以上的积极措施，結果各乡都建立有中心小学，几乎每个保都有分校，仅蔡店区就有三十余所小学。有些条件較好的小学还开设有初中班。中学也在发展，培养出大批的干部，解放后蔡店区的二百位中小学教員中就有百余人是当时的黄陂中学的毕业生。除普通学校外，还有政府直接开办的干部学校。一九四三年在蔡店开办了陂安南青年干部学校专门培养地方干部，學員是由各地抽調来的干部，他們学习和生活的費用全由学校供給。致于适应各个时期中心工作需要，而开办的短期訓練班就更多了。新四軍也在蔡店区开办了教导队抽調地方干部培养軍事人材。

此外，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掃盲運動的高潮。當時各村普遍開辦了夜校，由各小學老師任教，從五六歲的小孩到白髮蒼蒼的老公公都爭着上夜校。掃盲中推廣了陝甘寧邊區的“夏陶然”教學路線（夏是陝甘寧邊區一位小學老師他把他的學生分散羣眾中去，利用放牛，打柴和干其他農活的机会，教羣眾讀書識字，在掃盲中取得很大成績）。

在工農業大發展的推動下，根據他的文教事業得到了蓬勃發展，面目煥然一新。

由於黃陂縣正確貫徹了中央和邊區黨委關於開展大生產運動的指示，充分發動了羣眾，根據地的“組大”和大生產運動取得巨大成績，這個運動廣泛深入的開展具有重大歷史意義。

首先大大改善了根據地人民生活，基本上解決了人民的衣食問題。一般工人除自己吃用外，還能養活數口之家。手工業工人也較過去富裕得多。農民生活有顯著提高，一般都能自給自足，加上積極開展副業生產，許多農民家庭都有盈餘。當時農民爭相送公糧已成為風氣，軍糧得到根本解決，廣大羣眾在物質上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戰爭。解放區生產的全面大發展，從根本上徹底粉碎了敵人和國民黨的經濟封鎖，從物質上鞏固了根據地並為大反攻作了充分的物質準備，軍隊參加生產可自給一部分糧食，既減輕了人民負擔，軍隊也受到鍛煉。

其次是農救會的組織更加擴大，作用也大大加強。農救會直接領導了農民的減租減息鬥爭，同時在組織和動員農民大搞農副業生產上也起了重大作用。

第三，在運動中湧現出一大批工農積極分子，參加了黨和政權的組織，使得黨的組織得到迅速發展。當時許多鄉、保都普遍建立了支部，至一九四五年度蔡店區就有170多個黨員（包括正式黨員和候補黨員）黨在农村中扎下了牢固的根子。而鄉保基層政權只有到這時才得到徹底改造，行政效率大為提高。

第四，通過大生產運動，使得軍民關係，黨羣關係和干羣關係更加密切了，擁政愛民、擁軍優抗已成為邊區一項十分良好的制度，使得黨政軍的羣眾基礎更加廣泛和鞏固。

第五，在組大運動中，廣大幹部受到鍛煉和提高。組大運動是黨的羣眾路線的具體貫徹。通過這一運動，許多幹部都學會了羣眾路線的工作方法，提高了他們的工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經過和羣眾“三同”幹部的思想作風有很大轉變，加強了羣眾觀點和勞動觀點，幹部和羣眾已真正建立了平等的關係，這是我黨培養幹部的根本路線，對目前知識分子幹部的改造有着重大的現實意義。

總之，經過整風“組大”和大生產運動，使得根據地得到空前的鞏固和發展，為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打下牢固的思想基礎和物質基礎。

三、新四軍局部反攻，根據地的擴展：

（一）新四軍第五師在邊區局部反攻的開展：

一九四四年是國際形勢大轉折的一年。蘇聯紅軍給了德寇以殲滅性的打擊，恢復了全部國土，並正在乘勝追殲殘敵。意大利法西斯被戰敗。在中國的打擊下，日寇的處境更加困難。為把在華日軍與孤懸於南洋的日軍聯繫起來，日寇在正面戰場發動了新的進攻，以圖打通大陸交通綫。於是敵人在後方的兵力更加空虛，在這種有利的形勢下，鄂豫邊區軍民與全國各解放戰場一起發動了局部反攻。

一九四四年在鄂東敵後，雖然敵人大兵團的“掃蕩”減少了，但為了保持其後方兵站基

地和交通线的安全，小规模“扫荡”“清乡”则更加频繁，尤以近武汉的交通线两侧最为激烈。在这样激烈的斗争中，在我五师部队强大的攻势下，打破了几年来孤立作战的局面，与新四军其它兄弟部队会师。边区成为南北敌后战场八路军与新四军的重要联络点，并收复了鄂南、湘鄂边的大片土地，使根据地扩展为包括鄂、豫、湘、赣、四省各一部分，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广大地区。

在熾热的斗争中，我五师健儿战斗力也空前增强，更能出色地完成歼灭战的任务。一九四四年五月，在陂安南羊子山战斗中，击败敌数百人。敌为图报复，以大规模的兵力向黄陂南部进行“清乡”“扫荡”。复于六月中旬，纠集伪十一师主力企图蠢动。我军积极部署，同时，地方武装与民兵也加紧了侦察与监视敌人行动的活动，二十日，伪师长李保莲率主力配合日寇共两千余人，从宋埠进攻黄陂与陂安南，沿途遭到我民兵不断袭击，我主力也相机集结绕至敌后，出其不意，在龙王山一带包围歼毙敌伪六、七十人，俘二百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伪师长李保莲也被生擒。龙王山战斗是边区局部反攻中最著名的战斗。它沉重地打击了敌人，鼓舞了群众，黄安人民听到捷报后，欣喜相告，纷纷向新四军战士进行慰问。此外，县境以内新四军的小型出击与歼灭战也接连不断。

在我军有力打击与政治工作影响下，日伪军心日益动摇，伪军成批投诚，如一九四四年伪十一师二十三团六十余人当场击毙伪中队长及一个排长，带机枪二挺，步枪四十余枝，向我投诚。

(二)群众性对敌斗争的更加活跃，反摩擦斗争的胜利，根据地的扩展。

在局部反攻胜利的条件下，我小支的游击队与民兵更加活跃了。这一时期斗争的特点，是战斗规模的扩大，我们更加主动，更善于用偷袭、伏击，化装奇袭等巧妙的方式，以很小的代价出奇制胜，创造了许多卓越战绩。

一九四四年，陂四区中队四十余人，化装混入敌横山据点，仅发一枪就俘擄了全部伪军保安队的四五十人。一九四四年八月，陂四区中队在公路附近活动，俘擄十一师伪军十三人，旋即化装成伪军，袭击方家集敌堡，毙敌小队长，缴长枪两枝。一九四四年黄陂县大队四十余人，在方安榨附近伏击伪过路部队三百余人，毙伤敌伪十余人，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此外敌伪的“清乡”与小型“扫荡”，经常为我击退。如一九四五年，敌六十人伪军四十余人到王家河湾抢劫，我区中队赶来阻击，毙伪军十余人，夺回全部被劫财物。这时，我公路沿线民兵也更加活跃。一九四四年，祁家湾民兵，不断破坏黄孝公路路面，多次炸毁和尚桥、土桥、盛家桥、花石桥等公路桥梁，我区中队先后在甘棠铺，姚家集附近击毁敌人军用卡车二辆。

正当国际上反法西斯力量以绝对优势压倒了法西斯势力，解放区局部反攻不断取得胜利，日寇最后崩溃已为期不远的时候，国民党为消灭抗日力量，抢夺胜利果实，对我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一九四四年五月，49军两个师顽军开往黄安八里湾，企图破坏我夏收夏征，我第二军区集中了四个团兵力，一举将其击退。

根据地的顽特也进一步被我们肃清，一九四三年冬，破获了在蔡店地区进行造谣，贴反动标语，割我电线的三青团秘密组织，分别教育释放交群众监督。

对敌顽斗争的胜利，扩大了根据地，方梅区的望东乡成为了根据地。武湖的根据地一直伸展到汉麻公路以南的几个乡。游击区南抵长江，可到县城周围，敌人进攻再也不能达到王

家河以北，在陂四區黃孝公路以北，成為我巩固的根据地，游击区由原来的建安集，同興集一綫向南伸延至張家店、橫店，可達城下五里墩。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扩展，更加压缩了敌占区，敌人的活动只能在駐地周圍几里路的范围以內。

从組織羣众大多数开始的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发展了人民抗日力量，一九四四年开始的局部反攻，削弱了敌人，扩大了根据地游击区，壮大了我們的武装力量，这一切为大反攻作好准备。

四、全面大反攻，抗日战争的最后勝利：

一九四五年，苏联紅軍向德寇发动了强大的攻势，直搗法西斯窠穴——柏林。五月七日，德寇宣布投降。苏联紅軍，經過短期的休整，就揮师东向，八月八日对日宣战。八月十五日以雷霆万鈞之势一举歼灭八十万關东軍，日寇无条件投降，八年艰苦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喜訊傳來，黃陂人民无不欢喜若狂，苦难的日子过去了，大家都期望着过和平、民主、幸福的生活。

抗日的炮声还未完全停止，国民党反动派就开始穷凶极恶的搶夺胜利果实。他們指令各地日伪軍“負責維持治安”，拒絕向八路軍新四軍繳械投降，黃陂的大地主胡康民等也儼然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現，唆使境內日伪拒向抗日軍民繳械。我們深入敌占区进行宣傳，防止敌人破坏，軍民配合包圍敌据点，对敌伪展开政治宣傳攻势，动员他們向我投降。虽然由于国民党的阻撓破坏，使这一工作未能順利进行，但在我們軍的圍困与攻击下，敌伪最后不得不被迫撤走，我們收复了黃陂县被淪陷七年的全部国土。

抗战虽然胜利了，但人民的希望并未实现，接着新的斗争又开始了。

小結：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正式开始了大規模的进攻，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空前偉大和广泛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共黃陂特支成立后，从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領導了黃陂人民的抗日斗争。同时正确地貫徹了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政策，动员了抗日的力量，团結了抗日的同盟者，因而充实和扩大了抗日队伍，孤立了敌人，使我們有了战胜日寇的基本条件，这一成績的取得，充分証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政策的正确。

一九四〇年黃陂抗日根据地在党领导下開闢出来了，这样就使党領導下的抗日力量，有了执行自己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驅逐敌人目的战略基地。根据地建立后，旋即遭到敌、伪、頑的夹击，使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但由于党的正确領導和根据地軍民英勇、頑强的斗争，以及各項政策的实施，因而使根据地的軍民在党领导下，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反“扫蕩”反“蚕食”反“清乡”的胜利。并击退了蔣介石集团的反共逆流，从而使根据地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并为以后根据地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为了迅速发展抗日力量和准备反攻的胜利，一九四三年年底和一九四四年，中共黃陂县委根据中央和边区党委的指示，在党内整頓了三风，同时充分发动了羣众和依靠羣众，进行了大規模的生产建设，因而为根据地的反攻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这些胜利，一方面反映了党的英明和偉大，另方面充分体现了我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不是孤立的，片面的抗战，而是得到了人民羣众拥护和支持的，是全面的抗战，这一点也就是我們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决定因素。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再一次証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偉大的党。也証明

了中国人民要想免受奴役和压迫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

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还证明了工人、农民和其它劳动人民是革命的基本力量。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群众的拥护，依靠人民战争与统一战线，是可以胜任何强大的敌人的。

（该文分两期刊出，前半部刊载在本学报1959年第8期）